

# 户籍身份、社会融合与公平分配

## ——来自小学生田野实验的证据

罗俊 王鑫鑫\*

**摘要** 户籍制度对中国社会的整体影响一直都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但户籍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在社会融合过程中对人们心理感受的微观影响却缺乏实证依据。本文运用田野实验方法,以本地户籍与外地户籍小学生为实验对象,通过“启动”技术将户籍身份外生地引入最后通牒博弈中,考察户籍身份的引入是否影响小学生之间的公平分配。实验结果显示,户籍身份的概念及其表征的不平等已经植入人们的少年时代,并进而影响了他们在社会融合过程中固有的公平感。

**关键词** 户籍身份 社会融合 公平分配

### 一、引言

户籍制度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行政制度,在人口统计、城市管理、资源配置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口流动(Wu 和 Treiman, 2004),造成了城市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蔡昉等, 2001; 孟凡强和吴江, 2014),导致收入差距拉大(陆铭和陈钊, 2004; Whalley 和 Zhang, 2007; 安虎森等, 2011)、阶层分化加剧(陆益龙, 2008; 万海远和李实, 2013),从而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陈钊和陆铭, 2008; 张文武和张为付, 2016),制约着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2014 年 7 月 24 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统一居民户口登记制度的实行打破了农民与市民之间的界限,促进了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但城市内部各种公共服务的享有是以本地户籍为前提的。于是,城市内部就形成了本地户籍人口与非本地户籍人口之间的分割。《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指出,受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影响,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 2 亿多农民工及其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杨菊华, 2015)。

在诸多公共服务中,流动劳动者子女所能享受的教育资源是较重要的方面之一(陈

\* 罗俊,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浙江财经大学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 E-mail: luojun@zufe.edu.cn; 王鑫鑫(通讯作者),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E-mail: xxwang@zufe.edu.cn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钱塘新区学源街 18 号,邮政编码:310018。鸣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073117)、浙江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2021C2504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773108)的资助。感谢共青团上城区委员会、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局的支持;感谢俞青、赵盛山、林瀚、张雯燕、牛一凡、龚婕暄、邓圣楠等的协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钊 2015)。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7 年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数量为 1 897.45 万人,近 5 年增加了 283.86 万人,增幅为 17.6%。教育资源均等化对流动劳动者子女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通过积累自身人力资本,提升潜在就业机会,改善未来经济地位(Benjamin 2014; Jackson 等 2016);能够有效改善中国劳动力市场上长期的技能结构,增加阶层流动性(Wantchekon 等 2015)。

在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资源均等化上,国家政策层面已经有了明确、积极的努力<sup>①</sup>,但政策改善的作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若是要从更微观的层面考虑长期的户籍制度对公众心理及认知观念所带来的作用,并进一步关注这一心理及认知观念在外地户籍与本地户籍子女受教育过程中带来的社会融合问题。那么,我们显然需要以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来重新审视以上问题,为探讨城市化进程中非本地人口融入城市的社会机制提供证据,以完善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和方案,更好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进程。

户籍制度对个体心理与认知造成的微观影响在于其所带来的与身份有关的不平等。户籍制度将公民分为了两种不同的户籍类型,由此带来了社会权益的差异。而社会权益上的差异就可能使人们形成一种社会观念,即本地户籍人口与外地户籍人口代表着两种不平等的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那么这一与户籍身份有关的不公平是否会改变人们在相互交往时固有的公平感,导致不同户籍身份群体也存在如不同种群、民族、宗派之间可能发生的对立和排斥,或造成人们对不同户籍身份的人群有着不同的公平分配要求和行为表现?对这些问题的解答需要进一步的实证依据。

为了检验户籍身份的引入与人们在社会融合过程中公平分配的改变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我们采用框架田野实验(framed field experiment)的研究方法,将户籍身份外地人引入博弈实验中,以直接考察户籍身份本身对人们公平感的影响。实验中用来表征公平分配的博弈结构是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Güth 等,1982)。为了避免职业、社会阶层、收入等因素的干扰,检验出户籍身份本身对人们固有公平感的影响,我们招募三到六年级的小学生作为实验对象。同时采用“启动”(priming)<sup>②</sup>这一成熟的心理学研究方法(Bargh 2006)来引入小学生对自己户籍身份的认识以及对不同户籍身份在日常生活中会受到不同待遇的感受,从而考察这一认知感受是否会决定他们在博弈决策中的公平分配。

实验结果表明,小学生被试(subjects)<sup>③</sup>对户籍身份已有明显的认识,并且倾向于认为本地学生会比外地学生得到更好待遇,而这种认知直接导致了被试在最后通牒博弈中面对不同户籍身份的博弈对象时的不同决策选择:不论是本地户籍的提议者还是外地户籍的提议者,都会在面对外地户籍的响应者时比面对本地户籍的响应者时分配显著更高的提议额。本地户籍的响应者在面对外地户籍的提议者时,更不愿意接受针对

① 如国务院正式印发的《“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的文件中就提出对推进随迁子女教育均等化的要求。

② 启动效应(priming effect)是认知心理学领域的一项技术,实验者通过引入某种刺激(图像、音频、文本等)激活被试社会结构中的某些认知,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经历、感受。近年来,实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社会身份的启动对人们行为和态度的影响(Benjamin 等 2010; Hoff 和 Pandey 2006)。

③ 被试为实验术语,意为参与实验的对象。

自己的优势不平等分配;外地户籍的响应者在面对本地户籍的提议者时,更不愿意接受针对自己的劣势不平等分配。

本文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贡献:其一,实验被试是三到六年级的小学生,考察的是小学生在最后通牒实验中的行为表现,这可以丰富国内实验经济学研究的样本数据库;其二,我们检验了户籍这一社会身份的引入对实验被试亲社会行为(公平、互惠)的影响,因此我们的实验可以拓展有关中国社会背景下的亲社会行为研究思路;其三,文章尝试了田野实验的研究方法(Harrison和List,2004;罗俊等,2015),将实验场地从大学实验室转移到了被试日常生活、学习的地方,以图更加外部有效性地检验真实世界的社会问题。

本文余下部分将按以下结构展开:第二部分回顾文献;第三部分介绍实验的设计和开展过程;第四部分报告实验结果;第五部分给出文章的结论,讨论其意义。

## 二、文献回顾

近年来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重要贡献是发现违背经济学自利人假设,诸如公平、利他、合作、互惠等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的普遍存在(如Güth等,1982;Forsythe等,1994;Berg等,1995;Fehr等,1996),而利用最后通牒博弈来检验公平感和互惠行为的研究则是其中重要的一类实验。研究者们通过考察博弈中提议者的分配方案和响应者的回应来判断人们公平感的存在及强弱。Oosterbeek等(2004)对37篇论文中的75个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结果进行了汇总,发现提议者平均提供40%的初始禀赋给响应者,而响应者的平均拒绝比例为16%。人们的博弈决策也常常因为实验中初始禀赋(Cameron,1999)、地域文化(Henrich等,2001)、宗教(Chen和Tang,2009)、被试的职业(Carpenter et al.,2005)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尤其是当本身就蕴含着不公平待遇的社会身份被引入最后通牒博弈中时,人们固有的公平感及其博弈行为会不会因此而改变,研究者通过在实验室环境下建立不同的组群身份(group identity)研究了身份对公平感及亲社会行为的影响。Eckel和Grossman(2005)通过不同的分组和激励方式建立了实验中的组群身份,检验了各种组群身份对组群间被试合作行为的不同效应。McLeish和Oxoby(2007)以答题结果为标准在实验室中引入了组群身份,发现提议者在博弈中对组内成员会表现出比组外成员更高的公平感。Chen和Li(2009)基于个人艺术偏好在实验室中建立了分组,发现人们在面对组内成员时会比面对组外成员时表现出更多的公平、怜悯和合作行为。

还有研究将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身份引入田野实验中,以检验社会身份对人们经济社会行为的影响。如Bernhard等(2006)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选取了两个完全不同部落中的被试,来检验被试在共享行为上是否会对组内成员做出更有利的行为。Goette等(2006)的实验分析了瑞士军队中的身份在合作行为表现中的效应。Tanaka等(2016)在越南开展的实验,考察了不同族群形成的社会身份是否会影响个人的偏好和行为。类似的研究还发现性别、种族、区域等社会身份的凸显(identity salient)和差异对人们的社会偏好和市场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Fershtman和Gneezy,2001;Falk和Zehnder,2007;

Ferraro 和 Cummings, 2007; Benjamin 等, 2010)。

更多从社会现实出发的社会身份实验还有 Hoff 和 Pandey(2004, 2006, 2011) 对印度长期历史背景下所形成的等级身份的研究, 他们发现等级身份影响了人们的相互信任。Hoff 等(2011) 关注到等级身份对社会规范的影响。参照印度等级身份的实验研究, 学者们开始将中国的户籍身份引入实验中来。Afridi 等(2015) 选取北京市本地小学生和外地农民工子弟小学生作为被试, 发现户籍身份可能进一步拉大两种户籍身份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Dulleck 等(2020) 招募本地城镇户籍与外地农村户籍的保姆作为被试, 实验结果显示, 人们会有针对农村户籍被试更不合作的行为存在。Luo 等(2019) 在实验中考察了农村户籍与城市户籍被试在公平行为中的表现。Luo 和 Wang(2020) 在信任博弈实验中研究了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身份对信任与可信任行为的影响。

综上所述, 社会身份与人们的经济社会行为关系的研究受到了普遍的关注, 通过实验研究方法来检验这一因果关系也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采用。而户籍身份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身份, 其往往与地域、社会阶层、收入等因素交织在一起, 因此如何分离出户籍身份本身的效应, 检验出户籍身份对人们的经济社会行为的直接影响, 仍然是现有实证研究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 三、实验设计

我们于 2016 年 6 月 12 日在杭州市大学路小学实地开展了此次实验。大学路小学位于杭州市上城区, 全校共有 765 名一至六年级在校学生, 以及 18 个教学班级。为了达成实验预期, 科学规范地执行实验操作, 我们在实验被试选取、实验过程安排以及户籍信息公开等方面有如下设计和考虑。

#### (一) 实验被试选取

我们选择小学生而非成年人作为被试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一是本地户籍与外地户籍的成年人在受教育水平、职业、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 这些差异可能与户籍身份共同作用于被试的公平分配行为; 二是可以验证当户籍身份的差异还不太涉及自身切实利益(就业、医疗、购房、社会保障等)时, 对不同户籍身份带来的不平等认知, 是否会激发个人的公平分配倾向; 三是以往相关实证研究多采用成年人数据(汪汇等, 2009; Dulleck 等, 2020), 并证实了户籍身份的影响, 我们的实验可以考察这一影响是否在少年阶段便已形成, 以此有助于未来通过比较少年与成年人的数据, 进一步分离户籍身份、制度、经历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

我们还出于以下考虑, 确定了大学路小学的学生作为我们的被试: 第一, 大学路小学为杭州市属公办小学, 学生入学按“就近入学”原则, 这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学生除户籍身份外, 在其他个人特征方面(如地域)不会有较大差别。第二, 根据市教育局提供的学生户籍信息, 大学路小学学生由市区常住户籍学龄儿童及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构成。其中前者有 388 人, 后者有 377 人, 二者比例接近。第三, 大学路小学在分班时, 是将本地户籍学生和外地户籍学生混合编入, 这也避免了人为干预

(如相同户籍身份学生被编入同一班级)对实验结果的可能影响。

## (二) 实验过程安排

我们首先在征得校方和家长知情且同意的前提下,通过小学生的自愿报名在各班招募了352名三到六年级的小学生参加实验,其中男生176名,女生176名,本地户籍学生176名,外地户籍学生176名。而后我们对报名信息进行汇总,并根据校方提供的学生花名册,在保证各实验局所要求的不同户籍身份人数的情况下,对每个实验局中被试的年级、班级、性别等变量进行了平衡。

我们采用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实验包括提议者(proposer)与响应者(responder)两个博弈角色。提议者要在自己与响应者之间分配10元初始禀赋。若响应者接受提议者的分配方案,则双方按照这一分配方案获得相应的收益;若响应者拒绝提议者的分配方案,则双方均不能获得任何收益。无论被试做出什么选择,他们都能获得5元钱的出场费。我们设计了 $2 \times 2 \times 2$ 的实验,由是否公开被试的户籍身份信息、提议者户籍身份(本地或外地)、响应者户籍身份(本地或外地)三个变量组合而成。表1报告了各实验局设计的基本情况。实验采用被试间设计(between subjects design),每名被试只允许参加一场实验,扮演一个角色,所有被试均在匿名条件下进行博弈决策。

表1 实验设计基本情况

实验局	实验时间	户籍信息	提议者	响应者	提议者人数	响应者人数
Control 1	9:00—10:00	不公开	本地户籍	本地户籍	22	22
Control 2	9:00—10:00	不公开	本地户籍	外地户籍	22	22
Control 3	10:00—11:00	不公开	外地户籍	本地户籍	22	22
Control 4	10:00—11:00	不公开	外地户籍	外地户籍	22	22
Treatment 1	9:00—10:00	公开	本地户籍	本地户籍	22	22
Treatment 2	9:00—10:00	公开	本地户籍	外地户籍	22	22
Treatment 3	10:00—11:00	公开	外地户籍	本地户籍	22	22
Treatment 4	10:00—11:00	公开	外地户籍	外地户籍	22	22

实验场地为大学路小学的四个课外活动教室,我们将同一种户籍身份、博弈角色、户籍信息公开条件下的被试安排在同一间教室,即本地户籍提议者、本地户籍响应者、外地户籍提议者、外地户籍响应者分别在不同教室进行决策,以避免博弈方给决策者带来的干扰。提议者需要在10元以内的整数分配方案中进行选择,响应者则要对所有10元以内的整数分配方案做出是否接受的决策,实验员根据响应者所配对的提议者的实际分配,及其对该方案是否接受的决策来决定他们的收益。

## (三) 户籍信息公开

实验中被试的户籍身份需要被外生地引入,从而考察纯粹户籍身份带来的效应。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在户籍信息公开的实验局中采用了如下两项设计。

第一,在博弈选择正式开始前,我们通过实验前有关户籍身份信息的调查来“启动”

被试在日常生活中对户籍身份可能带来不同待遇的认知。调查问卷中的内容包括被试本人、同学、老师对被试户籍身份的判断以及被试对本地户籍学生与外地户籍学生在学费、得到的表扬、担任班干部情况、零花钱数量方面是否有差别的判断。

第二,有关户籍身份信息公开的方式。我们通过在被试进行选择的卡片上写明博弈双方户籍身份的方式来公开户籍信息。需要说明的是,在利用实验前的问卷调查和实验中公开户籍身份信息来唤起被试对不同户籍身份所可能存在差别的真实想法和认识时,我们特别注意采用中性语言询问和陈述有关户籍身份的信息,以防止可能的实验员需求效应(experimenter demand effect)(Zizzo 2010)。

## 四、实验结果

关于实验结果的分析,我们将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首先对本地学生与外地学生的个人社会特征情况进行检验;其次通过实验前问卷调查的数据来判断被试有关户籍身份的认知,以及对于不同户籍身份可能带来不同待遇是否有所感受;再次,分别对不同实验场次之间提议者和响应者决策的差异进行非参数检验;最后,对提议者决策和响应者决策做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包括检验被试对不同户籍身份可能带来不同待遇的认知与博弈决策之间的相关性。

### (一) 描述性统计

为了便于在实验数据处理时控制本地学生与外地学生在个人特征方面的差异,我们在实验的博弈过程结束后,利用问卷调查方式收集了被试的基本信息。总共回收了352份问卷,其中本地学生176名,外地学生176名。问卷基本信息主要包括性别、民族、年龄、年级、家中小孩人数、担任班干部情况、父母亲最高学历、成绩排名情况、零花钱数量等。

问卷数据的t检验结果显示,本地户籍与外地户籍被试在性别、民族、年龄、年级、是否担任班干部、家中小孩人数、成绩排名情况、每天零花钱等个人基本特征方面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只有本地户籍被试家中小孩人数要显著少于外地户籍被试( $p=0.005$ );本地户籍被试父亲与母亲的最高学历要显著高于外地户籍被试( $p<0.01$ ;  $p<0.01$ )。

### (二) 被试对于户籍身份的认识和感受

我们还需要考察小学生被试对户籍身份的认识和感受,如他们是否明晰自己的户籍身份以及他们是否会认为不同户籍身份的小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了不同的对待。因此,我们对被试在实验前所填写的有关户籍身份的问卷调查进行了分析。

#### 1. 有关户籍身份的认知

我们通过“你会说本市的语言吗”“你认为自己是本市人吗”“你周围的同学认为你是本市人吗”“你的老师认为你是本市人吗”等问题来启动小学生被试对户籍身份的认知。本地学生与外地学生两类户籍被试所回答问题的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本地学生与外地学生对户籍身份认知的情况

	本地户籍被试			外地户籍被试		
	会(是)	不会(不是)	不知道	会(是)	不会(不是)	不知道
会说本市语言吗	65.18%	34.72%	—	12.50%	87.50%	—
认为自己是本市人吗	85.20%	5.75%	9.05%	12.12%	67.30%	20.58%
周围同学认为你是本市人吗	58.25%	9.50%	32.25%	12.50%	55.85%	31.65%
你的老师认为你是本市人吗	67.25%	9.25%	23.50%	8.20%	65.58%	16.22%

从上表结果可见,本地学生与外地学生显然对自己的户籍身份有一定认知。大部分本地户籍的被试表达了自己会说本市语言,认为自己是本市人,以及周围同学与老师也都认为他们是本市人的态度;而大部分外地户籍被试表达了自己不会说本市语言,不认为自己是本市人,以及周围同学与老师也都不认为他们是本市人的态度。

2. 有关不同户籍身份有所差异的认知

在考察了实验中的总体样本对自己户籍身份的认知后,我们还关心通过实验前的调查问卷是否启动了被试有关不同户籍身份的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是否受到不同对待的认知,包括他们的上学费用、当班干部的数量、受老师表扬的情况以及零花钱数量等。问卷结果显示,学生被试(不论本地学生还是外地学生)在回答关于不同户籍身份的学生是否受到不同对待的提问时,大多倾向于认为本地学生会比外地学生得到更好待遇(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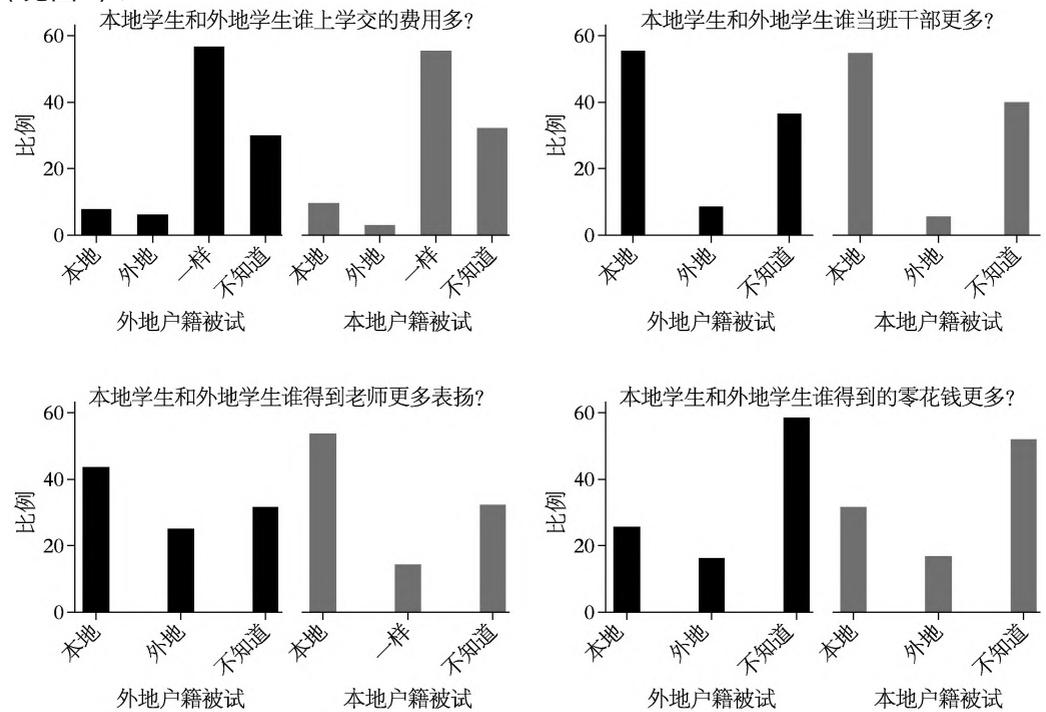


图1 不同户籍身份学生对他们是否受到不同对待的认知

我们对结果进行更细致的检验(Wilcoxon signed-rank test),发现不论是本地学生还是外地学生都认为本地学生担任班干部的数量要显著高于外地学生[外地被试:本地 vs. 外地( $z=2.564$   $p=0.036$ ) ,本地 vs. 不知道( $z=2.013$   $p=0.048$ );本地被试:本地 vs. 外地( $z=3.988$   $p=0.007$ ) ,本地 vs. 不知道( $z=3.105$   $p=0.022$ )]<sup>①</sup>。不论是本地学生还是外地学生都认为本地学生零花钱数量要显著多于外地学生[外地被试:本地 vs. 外地( $z=4.096$   $p=0.005$ ) ,本地 vs. 不知道( $z=2.125$   $p=0.042$ );本地被试:本地 vs. 外地( $z=4.525$   $p=0.003$ ) ,本地 vs. 不知道( $z=1.976$   $p=0.052$ ) ]。

### (三) 提议者数据分析

虽然本地学生与外地学生在各自报告的个人社会特征方面基本一致,但他们却都认为不同户籍身份的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有着不同的待遇。那么,这种对不同户籍身份会带来不同对待的认知,将如何影响到他们在面对与自己户籍相同或不同的对方时所表现出来的公平分配行为呢?

#### 1. 提议额的非参数检验

首先,我们利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ranksum test)比较无户籍身份信息情况下,本地户籍提议者面对不同户籍身份的响应者,以及外地户籍提议者面对不同户籍身份的响应者时提议额是否会发生改变。检验结果显示:在无户籍身份信息的情况下,不论提议者为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户籍(Control 1 vs. Control 3: $z=0.158$   $p=0.8216$ ; Control 2 vs. Control 4: $z=0.224$   $p=0.7652$ ),响应者为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户籍(Control 1 vs. Control 2: $z=0.135$   $p=0.8925$ ; Control 3 vs. Control 4: $z=0.111$   $p=0.9114$ ) ,提议额之间均没有显著差异。

在引入户籍身份信息情况下,本地户籍提议者面对外地户籍响应者比面对本地户籍响应者时分配显著更高的提议额(Treatment 1 vs. Treatment 2: $z=-1.929$   $p=0.0537$ );外地户籍提议者面对外地户籍响应者也比面对本地户籍响应者时分配显著更高的提议额(Treatment 3 vs. Treatment 4: $z=-1.863$   $p=0.0624$ )。此外,本地户籍提议者相比外地户籍提议者在面对本地户籍响应者时提议额并无显著差异(Treatment 1 vs. Treatment 3: $z=0.124$   $p=0.8762$ );本地户籍提议者相比外地户籍提议者在面对外地户籍响应者时提议额也无显著差异(Treatment 2 vs. Treatment 4: $z=0.0892$   $p=0.9463$ )。

#### 2. 提议额的计量回归分析

经过对各实验组提议额之间的非参数检验,我们发现在无户籍身份信息的情况下,本地户籍的提议者与外地户籍的提议者所分配的提议额并没有显著差异。然而,当博弈双方的户籍身份信息被公开后,本地户籍提议者与外地户籍提议者都会分配给外地户籍响应者更多的提议额。为了更加稳健地分析户籍信息公开、提议者的户籍身份与响应者的户籍身份对提议者分配决策的影响,我们进一步构建了回归模型(见表3)。模型以最后通牒博弈中提议者分配的提议额为被解释变量,在控制个体社会特征

① 括号内表述的内容为不同实验被试(外地被试、本地被试)分别认为本地被试相对于(vs.)外地被试在学校中的表现是否有所不同,零假设为两者均值相同, $z$ 值为 Wilcoxon signed-rank test 统计量, $p$ 值为相伴概率。下文相同。

条件下,以户籍身份信息公开以及提议者和响应者的户籍身份为解释变量。其中,户籍身份信息公开为虚拟变量,1表示公开户籍身份信息,0表示不公开户籍身份信息;提议者户籍=1为本地户籍身份,0表示提议者为外地户籍身份;响应者户籍=1为本地户籍身份,0表示响应者为外地户籍身份。在模型(1)的基础上,我们还分别加入了户籍身份信息公开、提议者户籍身份与响应者户籍身份两两之间的交互项。

表3 提议者数据的Tobit回归结果

模型	(1)	(2)	(3)	(4)
户籍信息公开	0.19 (0.26)	0.19 (0.26)	0.16 (0.35)	0.85** (0.35)
提议者户籍	0.11 (0.24)	0.14 (0.34)	0.09 (0.34)	0.12 (0.24)
响应者户籍	-0.60** (0.24)	-0.58* (0.34)	-0.61** (0.24)	0.04 (0.33)
性别	-0.10 (0.24)	-0.10 (0.24)	-0.10 (0.24)	-0.07 (0.24)
年龄	0.02 (0.09)	0.02 (0.09)	0.02 (0.09)	0.03 (0.09)
是否班干部	-0.05 (0.26)	-0.05 (0.27)	-0.05 (0.26)	-0.10 (0.26)
兄弟姐妹人数	-0.16 (0.13)	-0.16 (0.13)	-0.16 (0.13)	-0.13 (0.13)
父亲教育程度	0.34** (0.17)	0.34** (0.17)	0.35** (0.17)	0.37** (0.16)
母亲教育程度	-0.18 (0.15)	-0.18 (0.15)	-0.18 (0.15)	-0.17 (0.15)
成绩排名	0.19 (0.14)	0.19 (0.14)	0.19 (0.14)	0.18 (0.14)
提议者户籍* 响应者户籍		-0.05 (0.48)		
提议者户籍* 户籍信息公开			0.05 (0.49)	
响应者户籍* 户籍信息公开				-1.30*** (0.47)
sigma_cons	1.57*** (0.08)	1.57*** (0.08)	1.57*** (0.08)	1.54*** (0.08)
N	176	176	176	176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个体社会特征的情况下,提议者在面对本地户籍的响应者时,会减少他们的提议额。尤其是在模型(4)中,户籍身份信息公开与响应者户籍身份共同影响着提议者的决策,在户籍身份信息公开情况下,响应者为本地户籍相比较外地户籍,会使得提议者显著减少1.30元的提议额。

### 3. 对户籍身份的认知与提议者决策的相关分析

根据实验前的调查问卷结果,我们发现小学生会对不同户籍身份可以得到不同待遇有所认知。那么,这一针对户籍身份的认知是否就决定了提议者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的决策呢?为了验证二者之间的关联,我们将提议者在实验前问卷中的回答,包括本地学生与外地学生在零花钱数量、班干部数量、受老师表扬情况、上学费用等方面是否有所差别,分别与他们在博弈中的提议额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此外,我们还加入一些交互项,在零花钱与响应者户籍的交互项中,零花钱=0表示本地学生零花钱更多,零花钱=1表示外地学生零花钱更多;在班干部与响应者户籍的交互项中,班干部=0表示本地学生当班干部的更多,班干部=1表示外地学生当班干部的更多;在受到表扬与响应者户籍的交互项中,受到表扬=0表示本地学生受到老师的表扬更多,受到表扬=1表示

外地学生受到的表扬更多;在学费与响应者户籍的交互项中,学费=0表示本地学生上学交的费用更多,学费=1表示外地学生上学交的费用更多(见表4中的模型(1)一(4))。

表4 户籍认知对提议额影响的Tobit回归结果

模型	(1)	(2)	(3)	(4)
提议者户籍	0.19 (0.33)	0.14 (0.37)	0.08 (0.38)	0.19 (0.34)
响应者户籍	-4.80 <sup>***</sup> (0.83)	-3.10 <sup>***</sup> (0.90)	-0.49 (1.09)	-4.35 <sup>***</sup> (0.79)
外地学生零花钱更多	-1.04 <sup>**</sup> (0.47)			
不知道	-1.21 <sup>**</sup> (0.54)			
零花钱* 响应者户籍	1.82 <sup>***</sup> (0.38)			
外地学生班干部更多		-1.17 <sup>**</sup> (0.55)		
不知道		-1.15 <sup>*</sup> (0.63)		
班干部* 响应者户籍		0.92 <sup>**</sup> (0.43)		
外地学生受表扬更多			0.69 (0.63)	
不知道			0.71 (0.67)	
受到表扬* 响应者户籍			-0.30 (0.45)	
外地学生学费更高				-1.62 <sup>**</sup> (0.66)
一样高				-0.83 (0.53)
不知道				-1.96 <sup>***</sup> (0.63)
学费* 响应者户籍				1.23 <sup>***</sup> (0.28)
sigma_cons	1.56 <sup>***</sup> (0.12)	1.71 <sup>***</sup> (0.13)	1.76 <sup>***</sup> (0.13)	1.57 <sup>***</sup> (0.12)
N	88	88	88	88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差。

上表的回归结果显示,认为本地学生零花钱更多的小学生,在面对本地户籍的响应者时会分配给对方更少的提议额;认为本地学生担任班干部更多的小学生,在面对本地户籍的响应者时会分配给对方更少的提议额;以及认为本地学生所支付的学费更多的小学生,在面对本地户籍的响应者时会分配给对方更少的提议额。这些结论表明,实验被试有关不同户籍身份的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不同对待的认知,直接影响了提议者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对不同户籍身份响应者分配的提议额。

#### (四) 响应者数据分析

在对提议者决策进行细致分析后,我们还需要重点考察博弈中的响应者在接收到提议者的分配方案后,所做出的是接受还是拒绝这一分配方案的决策。为了能在更宽广范围内研究响应者对不同分配方案的接受程度,我们并没有让响应者只针对一种分配方案进行决策,也不限定响应者在对所有分配方案做出考虑时“应该”有一个所谓理性选择的“最小接受额”,而是让响应者对所有可能的整数分配方案,分别做出是接受还是拒绝这些分配方案的判断。

##### 1. 响应者偏好类型

通过整理响应者对所有可能的整数分配方案的判断,我们可以归纳出三种响应者的偏好类型:一是纯粹利他偏好,拒绝提议者分配给响应者较多的提议额(如图2A的前端拒绝样式);二是理性互惠偏好,拒绝提议者分配给响应者较低的提议额(如图2B的后端拒绝样式);三是公平偏好,拒绝提议者分配给响应者较多的提议额,或分配给响应者较低的提议额(如图2C的两端拒绝样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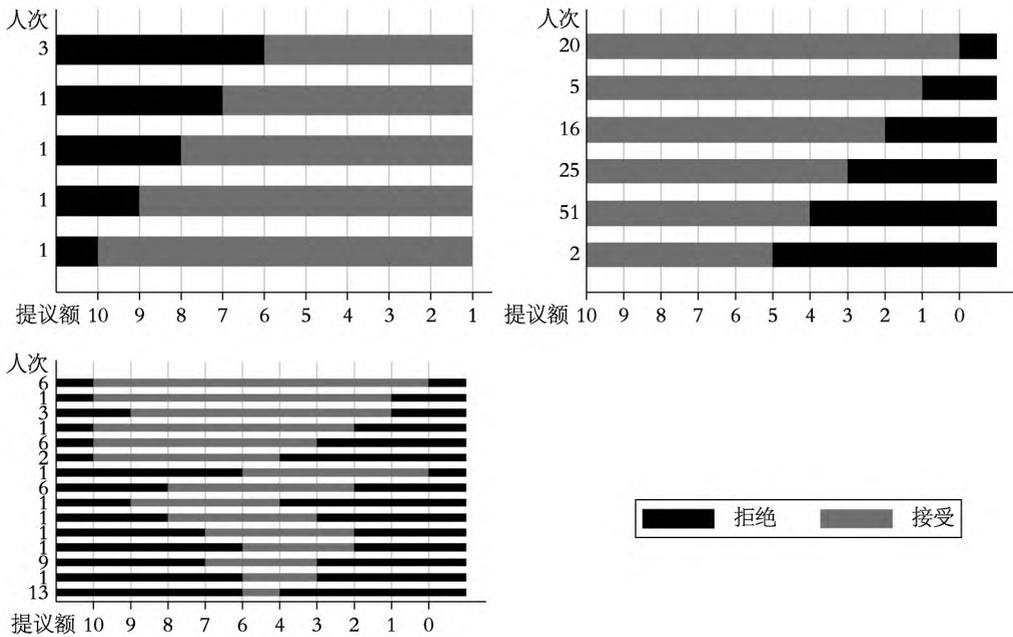


图2 三种偏好类型的响应者对不同分配方案的决策判断

如图显示,纯粹利他偏好类型的响应者在面对所有可能的整数分配方案时,会选择拒绝那些分配给响应者较多数额的方案,如拒绝提议者分配给自己4元,给响应者6元;拒绝提议者分配给自己3元,给响应者7元;拒绝提议者分配给自己2元,给响应者8元;拒绝提议者分配给自己1元,给响应者9元;拒绝提议者分配给自己0元,给响应者10元;但接受其他整数分配方案。

理性互惠偏好类型的响应者在面对所有可能的整数分配方案时,会选择拒绝那些分配给响应者较低数额的方案,如拒绝提议者分配给自己6元,给响应者4元;拒绝提议者分配给自己7元,分配给响应者3元;拒绝提议者分配给自己8元,分配给响应者2元;拒绝提议者分配给自己9元,分配给响应者1元;拒绝提议者分配给自己10元,分配给响应者0元;但接受其他整数分配方案。

公平偏好类型的响应者在面对所有可能的整数分配方案时,会选择拒绝那些分配给响应者较高或较低数额的方案,只接受相对均衡的方案,如只接受提议者分配给自己5元,分配给响应者5元的方案;但拒绝其他整数分配方案。在根据响应者对所有可能分配方案的不同选择,而做出响应者偏好类型的划分后,我们还关心不同实验组中响应者偏好类型的分布情况(见表5)。表中结果大致能反映出户籍身份信息的公开会使得三种响应者偏好类型出现的分布有所改变。

表5 不同实验组的响应者偏好类型分布

类型	Control 1	Control 2	Control 3	Control 4	Treatment 1	Treatment 2	Treatment 3	Treatment 4
利他	0	2	2	1	0	0	1	0
理性	10	6	8	13	2	5	2	4
公平	12	14	12	8	20	17	19	18
总计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 2. 响应者决策度量

虽然我们能观察到不同实验组中响应者偏好类型分布的差别,但我们仍然需要通过更为精确的数据指标来刻画响应者在博弈中的决策,以检验户籍身份信息的公开与户籍身份的不同对响应者决策的作用。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参考了由 Fehr 和 Schmidt (1999) 构建的有关个体“不公平厌恶”(inequality aversion) 的模型,他们认为人们会追求分配公平,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会导致个人效用的损失。“不公平厌恶”模型中最为重要的设定在于:自我收入高于他人收入以及他人收入高于自我收入的程度都与个人效用的减少呈正相关关系,前者被称为“优势不平等厌恶”(advantage inequality aversion),后者被称为“劣势不平等厌恶”(disadvantage inequality aversion)。

沿袭这一思路,我们从提议者的分配方案出发,考虑分配方案中提议者与响应者之间的收益差距。那么,不同分配方案就会对应不同的优势不平等程度与劣势不平等程度,响应者对这些方案的决策判断反映的即是他们对优势不平等与劣势不平等的承受能力。因此,我们以响应者在面对所有可能的整数分配方案时,所能接受的最大优势不平等(most advantage inequality, MAI) 与所能接受的最大劣势不平等(most disadvantage inequality, MDI) 来刻画响应者对提议者分配方案的回应。

## 3. 响应者决策的非参数检验

我们利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比较无户籍身份信息情况下,本地户籍响应者面对不同户籍身份的提议者,以及外地户籍响应者面对不同户籍身份的提议者时 MAI 与 MDI 是否会发生改变。检验结果显示:在无户籍身份信息的情况下,不论响应者为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户籍,提议者为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户籍,响应者的 MAI 数据与 MDI 数据均不会发生显著改变。

然而,在户籍身份信息公开情况下,本地户籍的响应者在面对本地户籍的提议者时会比面对外地户籍的响应者时有更高的 MAI 数据(Treatment 1 vs. Treatment 3:  $z = 2.046$   $p = 0.0408$ ); 外地户籍的响应者在面对本地户籍的提议者时也会比面对外地户籍的响应者时有更高的 MDI 数据(Treatment 2 vs. Treatment 4:  $z = -2.371$   $p = 0.0178$ )。

针对响应者 MAI 数据与 MDI 数据的非参数检验结果表明,在户籍身份信息公开情况下,本地户籍的学生在面对外地户籍的学生时,对分配方案的优势不平等的可接受程度更低; 外地户籍的学生在面对本地户籍的学生时,对分配方案的劣势不平等的可接受程度更低。

## 4. 响应者决策的计量回归分析

经过对各实验组两两之间 MAI 数据与 MDI 数据的非参数检验,我们分别考察了在

无户籍身份信息情况下与有户籍身份信息情况下,提议者户籍身份及响应者户籍身份这两个变量各自的变化对响应者决策的影响。为了能进一步地分析户籍身份信息公开、提议者户籍身份、响应者户籍身份在响应者回应决策中的作用,我们构建了以响应者的 MAI 数据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在控制个体社会特征条件下,以户籍身份信息公开以及提议者和响应者的户籍身份为解释变量。在以上模型的基础上,再分别加入户籍身份信息公开、提议者户籍身份与响应者户籍身份两两之间的交互项,构成了另外三个模型。表 6 中的数据为关于响应者 MAI 数据的 Tobit 回归结果。

表 6 响应者 MAI 数据的 Tobit 回归结果

模型	(1)	(2)	(3)	(4)
户籍信息公开	1.29** (0.57)	1.28** (0.57)	1.08 (0.76)	1.49* (0.79)
提议者户籍	0.69 (0.53)	0.45 (0.76)	0.47 (0.76)	0.69 (0.53)
响应者户籍	-0.78 (0.53)	-1.03 (0.75)	-0.79 (0.53)	-0.59 (0.75)
性别	-0.23 (0.53)	-0.23 (0.53)	-0.23 (0.53)	-0.23 (0.53)
年龄	0.24 (0.21)	0.24 (0.21)	0.24 (0.21)	0.24 (0.21)
是否班干部	-0.05 (0.58)	-0.01 (0.59)	-0.05 (0.58)	-0.06 (0.59)
兄弟姐妹人数	-0.38 (0.29)	-0.38 (0.30)	-0.38 (0.29)	-0.38 (0.30)
父亲教育程度	-0.66* (0.37)	-0.67* (0.37)	-0.63* (0.38)	-0.65* (0.37)
母亲教育程度	0.08 (0.33)	0.08 (0.33)	0.07 (0.33)	0.09 (0.33)
成绩排名	-0.06 (0.30)	-0.05 (0.31)	-0.07 (0.31)	-0.06 (0.31)
提议者户籍* 响应者户籍		0.48 (1.06)		
提议者户籍* 户籍信息公开			0.45* (1.07)	
响应者户籍* 户籍信息公开				-0.39* (1.06)
sigma_cons	3.45*** (0.20)	3.45*** (0.20)	3.45*** (0.20)	3.45*** (0.20)
N	176	176	176	176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差。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个体社会特征的情况下,户籍信息公开会改变响应者的回应决策,特别是户籍信息公开与提议者户籍身份,以及户籍信息公开与响应者户籍身份都共同影响着响应者的 MAI 数据。在户籍信息公开情况下,提议者为本地户籍相比外地户籍,会使得响应者显著增加可接受的优势不平等分配;在户籍信息公开情况下,响应者为本地户籍相比外地户籍,会显著减少响应者可接受的优势不平等分配。

之后,我们又考虑户籍信息公开、提议者户籍身份、响应者户籍身份对响应者 MDI 数据的影响。以响应者的 MDI 数据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回归模型,在控制个体社会特征条件下,以户籍信息公开、提议者户籍身份和响应者的户籍身份为解释变量。在此基础上,又分别加入户籍信息公开、提议者户籍身份与响应者户籍身份两两之间的交互项构成新的回归模型。以响应者 MDI 数据为被解释变量的 Tobit 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7 响应者 MDI 数据的 Tobit 回归结果

模型	(1)	(2)	(3)	(4)
户籍信息公开	-0.82 (0.64)	-0.86 (0.64)	0.10 (0.84)	-2.25** (0.88)
提议者户籍	-0.51 (0.59)	-1.12 (0.83)	0.45 (0.82)	-0.55 (0.59)
响应者户籍	0.46 (0.58)	-0.14 (0.83)	0.49 (0.58)	-0.90 (0.81)
性别	0.66 (0.59)	0.66 (0.59)	0.67 (0.58)	0.60 (0.58)
年龄	-0.23 (0.23)	-0.23 (0.23)	-0.22 (0.23)	-0.26 (0.23)
是否班干部	-0.04 (0.65)	0.03 (0.65)	-0.03 (0.65)	0.04 (0.64)
兄弟姐妹人数	-0.11 (0.32)	-0.10 (0.32)	-0.14 (0.32)	-0.18 (0.32)
父亲教育程度	-0.13 (0.41)	-0.15 (0.41)	-0.26 (0.42)	-0.20 (0.41)
母亲教育程度	0.30 (0.37)	0.29 (0.37)	0.36 (0.37)	0.28 (0.37)
成绩排名	0.10 (0.34)	0.13 (0.34)	0.15 (0.34)	0.14 (0.33)
提议者户籍* 响应者户籍		1.21 (1.17)		
提议者户籍* 户籍信息公开			-1.97* (1.19)	
响应者户籍* 户籍信息公开				2.79** (1.17)
sigma_cons	3.71*** (0.25)	3.70*** (0.25)	3.69*** (0.25)	3.68*** (0.25)
N	176	176	176	176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差。

模型(4)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个体社会特征的情况下,户籍身份信息公开会改变响应者的回应决策,户籍身份信息公开与响应者户籍身份会共同作用响应者的 MDI 数据,即在户籍身份信息公开情况下,响应者为本地户籍相比较外地户籍,会显著增加响应者可接受的劣势不平等分配。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户籍身份信息公开情况下,提议者为本地户籍相比较外地户籍,会使得响应者显著降低可接受的劣势不平等分配。

##### 5. 对户籍身份的认知与响应者决策的相关分析

我们同样还关心小学生对不同户籍身份可以得到不同待遇的认知,会如何影响响应者在博弈中面对不同分配方案时的决策。因此考虑响应者对本地户籍学生与外地户籍学生在零花钱数量、班干部数量、受老师表扬情况、上学费用等方面是否有所差别的回答,与他们在博弈中的 MAI 数据是否有关联,表 8 为 Tobit 回归结果。

表8 户籍认知对响应者 MAI 数据的 Tobit 回归结果

模型	(1)	(2)	(3)	(4)
提议者户籍	3.49** (1.37)	2.84** (1.32)	2.00 (1.67)	3.35*** (1.26)
响应者户籍	-1.17** (0.55)	-1.26** (0.57)	-1.18** (0.58)	-1.11** (0.54)
外地学生零花钱更多	1.21 (0.78)			
不知道	1.88** (0.88)			
零花钱* 提议者户籍	-1.12* (0.63)			
外地学生班干部更多		0.28 (0.79)		

续表

模型	(1)	(2)	(3)	(4)
不知道		1.54* (0.89)		
班干部* 提议者户籍		-0.84 (0.63)		
外地学生受表扬更多			0.33 (0.97)	
不知道			0.56 (1.04)	
受到表扬* 提议者户籍			-0.32 (0.68)	
外地学生学费更高				1.79** (1.03)
一样高				1.73 (0.81)
不知道				2.40* (0.94)
学费* 提议者户籍				-0.85* (0.45)
sigma_cons	2.55*** (0.20)	2.57*** (0.20)	2.62*** (0.20)	2.52*** (0.20)
N	88	88	88	88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差。

回归的主要结果表明, 响应者在面对本地户籍的提议者时可以接受更高的优势不平等分配, 而本地户籍的响应者则愿意接受更低的优势不平等分配。此外, 认为外地学生学费比本地学费更高的响应者, 会接受更高的优势不平等分配, 但当他们面对外地提议者时, 会减弱对优势不平等分配的接受程度。

最后, 需要检验响应者对不同户籍身份可以得到不同待遇的认知与 MDI 数据之间的相关性。我们将响应者在实验前问卷中的回答, 包括本地学生与外地学生在零花钱数量、班干部数量、受老师表扬情况、上学费用等方面是否有所差别, 分别与他们在博弈中的 MDI 数据纳入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见表 9)。

表 9 户籍认知对响应者 MDI 数据的 Tobit 回归结果

模型	(1)	(2)	(3)	(4)
提议者户籍	-1.26 (0.78)	-1.32 (0.80)	-1.54* (0.84)	-1.44* (0.80)
响应者户籍	-2.36 (1.91)	-1.83 (1.94)	0.39 (2.39)	-0.80 (1.86)
外地学生零花钱更多	-1.61 (1.10)			
不知道	-0.89 (1.28)			
零花钱* 响应者户籍	2.09** (0.88)			
外地学生班干部更多		-0.97 (1.18)		
不知道		-1.87 (1.39)		
班干部* 响应者户籍		1.94** (0.93)		
外地学生受表扬更多			-0.85 (1.40)	
不知道			-0.87 (1.51)	
受到表扬* 响应者户籍			0.60 (0.98)	
外地学生学费更高				-0.75 (1.61)
一样高				0.10 (1.24)

续表

模型	(1)	(2)	(3)	(4)
不知道				-0.91 (1.53)
学费* 提响应者户籍				1.06 (0.66)
sigma_cons	3.43 *** (0.34)	3.53 *** (0.35)	3.65 *** (0.36)	3.55 *** (0.35)
N	88	88	88	88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差。

回归结果表明, 响应者面对本地户籍的提议者相比面对外地户籍的提议者, 愿意接受的劣势不平等分配程度更低。此外, 认为本地学生比外地学生零花钱更多的本地户籍响应者, 愿意接受更高的劣势不平等分配。

## 五、结 语

本文运用框架田野实验的方法, 将户籍身份外地生引入最后通牒博弈中, 考察了小学生对户籍身份的认识和感受以及户籍身份的引入是否能影响被试的公平分配行为。结果显示, 户籍身份的概念及其表征的不平等已经植入人们的少年时代并进而影响了他们固有的公平感, 小学生对不同户籍身份所带来的不同待遇有一定心理认知。同时, 这种认知直接导致了被试在最后通牒博弈中面对不同户籍身份的博弈对象时有着不同决策。提议者在面对外地户籍的响应者时, 会比面对本地户籍的响应者时分配更高的提议额。本地户籍的响应者在面对外地户籍的提议者时, 更不愿意接受针对自己的优势不平等分配; 外地户籍的响应者在面对本地户籍的提议者时, 更不愿意接受针对自己的劣势不平等分配。

此外, 我们还发现越是认为本地学生相比外地学生在日常有更好待遇的被试, 越是在博弈中分配给本地户籍的响应者更少数额, 越是不能接受本地户籍的提议者分配给自己不公平的数额。因此我们推断, 小学生对不同户籍身份会带来不同待遇的心理认知, 使得他们在博弈中更愿意照顾弱势一方(外地户籍学生), 对强势一方(本地户籍学生)有更高要求。

本文也许可提供一定的实践意义。实验中虽然展示了小学生关于户籍身份的认识以及他们对两种户籍被试有着不同的要求和偏好, 但被试的公平分配和互惠行为始终较为稳定。这可说明小学生的公平感非常强烈, 且他们虽在不同的户籍身份可带来不同社会利益的背景下成长, 但由于自己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户籍身份给他们造成的不公平事件, 因此也就没有在实验中表现出不同户籍身份之间的排斥和区隔。也就是说, 不同户籍身份群体的分化可能只是由于户籍对流动人口的限制和不公平的公民待遇等区别性政策本身所导致的。我们也许能通过促进不同户籍群体之间的社会互动与交往来缓解非本地人口在城市中的社会融合问题。

## 参 考 文 献

- Afridi, F., L. Sherry and Y. F. Ren, 2015, "Social Identity and Inequality: The Impact of China's Hukou System,"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23(3): 17-29.
- Bargh, J. A., 2006, "What Have We Been Priming All These Years? On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s, and Ecology of Nonconscious Social Behavior,"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6(2): 147-168.
- Benjamin, F., 2014, "The Human Capital Stock a Generalized Approac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11): 3752-3777.
- Benjamin, D. J., J. J. Choi and A. J. Strickland, 2010, "Social Identity and Preferen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4): 1913-1928.
- Berg, J., J. Dickaut and K. McCabe, 1995, "Trust, Reciprocity and Social History,"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10(1): 122-142.
- Bernhard, H., E. Fehr and U. Fischbacher, 2006, "Group Affiliation and Altruistic Norm Enforce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2): 217-221.
- Cameron, L., 1999, "Raising the Stakes in the Ultimatum Game: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Economic Inquiry*, 37(1): 47-59.
- Carpenter, J., E. Verhoogen and S. Burks, 2005, "The Effect of Stakes in Distribution Experiments," *Economics Letters*, 86(3): 393-398.
- Chen, K. and F. F. Tang, 2009,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ibetans and Ethnic Han Chinese in Ultimatum Bargaining Experiment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5(1): 78-84.
- Chen, Y. and S. X. Li, 2009, "Group Identity and Social Preferen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9(1): 431-457.
- Dulleck, U., J. Fooker and Y. M. He, 2020, "Hukou Status and Individual-Level Labor Market Discrimination: An Experiment in China," *ILR Review*, 73(3): 628-649.
- Eckel, C. C. and P. J. Grossman, 2005, "Managing Diversity by Creating Team Identity,"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58(3): 371-392.
- Falk, A. and C. Zehnder, 2007, "Discrimination and In-Group Favoritism in a Citywide Trust Experiment," IZA Working Paper, No. 2765.
- Fehr, E., S. Gächter and G. Kirchsteiger, 1996, "Reciprocal Fairness and Noncompensating Wage Differential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52(4): 608-640.
- Fehr, E. and K. M. Schmidt, 1999, "A Theory of Fairnes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3): 817-868.
- Ferraro, P. J. and R. G. Cummings, 2007, "Cultural Diversity, Discrimination, and Economic Outcomes: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Economic Inquiry*, 45(2): 217-232.
- Fershtman, C. and U. Gneezy, 2001, "Discrimination in a Segmented Society: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6(1): 351-377.
- Forsythe, R., J. L. Horowitz, N. E. Savin and M. Sefton, 1994, "Fairness in Simple Bargaining Experiments,"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6(3): 347-369.
- Goette, L., D. Huffman and S. Meier, 2006, "The Impact of Group Membership on Cooperation and Norm Enforcement: Evidence Using Random Assignment to Real Social Group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2): 212-216.
- Güth, W., R. Schmittberger and B. Schwarze, 1982,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Ultimatum Bargaining,"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3(4): 367-388.
- Harrison, G. W. and J. A. List, 2004, "Field Experiment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2(4): 1009-1055.
- Henrich, J., R. Boyd, S. Bowles, C. Camerer, E. Fehr, H. Gintis and R. McElreath, 2001, "In Search of Homo Economicus: Behavioral Experiments in 15 Small-Scale Socie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2): 73-78.

- Henrich, J., J. Ensminger and R. McElreath, et al., 2010, "Markets, Religion, Community Size, and the Evolution of Fairness and Punishment," *Science*, 327( 5972): 1480-1484.
- Hoff, K. and P. Pandey, 2004, "Belief Systems and Durable Inequalities: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Indian Cast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 Hoff, K. and P. Pandey, 2006, "Discrimination, Social Identity, and Durable Inequali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96( 2): 206-211.
- Hoff, K. and P. Pandey, 2011, "Making up People: 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Identity and Development from Caste India," World Bank mimeo.
- Hoff, K., M. Kshetramade and E. Fehr, 2011, "Caste and Punishment: The Legacy of Caste Culture in Norm Enforcement," *Economic Journal*, 121( 556): 449-475.
- Jackson, C., R. Johnson and C. Persico, 2016, "The Effects of School Spending on Educational and Economic Outcomes: Evidence from School Finance Reform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1( 1): 157-218.
- Luo, J., Y. Chen, H. He and G. Gao, 2019, "Hukou Identity and Fairness in the Ultimatum Game," *Theory and Decision*, 87( 3): 389-420.
- Luo, J. and X. Wang, 2020, "Hukou Identity and Trust: Evidence from a Framed Field Experiment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59, 101383.
- McLeish, K. N. and R. J. Oxoby, 2007, "Identity, Cooperation, and Punishment," IZA Discussion Paper.
- Oosterbeek, H., R. Sloof and G. Kuilen, 2004,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Ultimatum Game Experiments: Evidence from a Meta-Analysis," *Experimental Economics*, 7, 171-188.
- Tanaka, T. and C. F. Camerer, 2016, "Trait Perceptions Influence Economic Out-group Bias: Lab and Field Evidence from Vietnam," *Experimental Economics*, 19( 3): 513-534.
- Wantchekon, L. M. Klasnja and N. Novta, 2015, "Education and 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 Evidence from Colonial Beni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0( 2): 703-757.
- Whalley, J. and S. Zhang, 2007, "A Numerical Simulation Analysis of ( Hukou) Labor Mobility Restrictions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3( 2): 392-410.
- Wu, X. and D. J. Treiman, 2004,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1955-1996," *Demography*, 41( 2): 363-384.
- Zizzo, D. J., 2010, "Experimenter Demand Effects in Economic Experiments," *Experimental Economics*, 13( 1): 75-98.
- 安虎森、颜银根和朴银哲, 2011, 《城市高房价和户籍制度: 促进或抑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中国劳动力流动和收入差距扩大悖论的一个解释》, 《世界经济文汇》第 8 期 41—54 页。
- 蔡昉、都阳和王美艳, 2001, 《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护》, 《经济研究》第 12 期 41—49 页。
- 陈钊, 2015, 《面向和谐发展的城乡融合: 目标、难点与突破》, 《国际经济评论》第 3 期 131—146 页。
- 陈钊和陆铭, 2008, 《从分割到融合: 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 《经济研究》第 1 期 43 卷 21—32 页。
- 陆铭和陈钊, 2004, 《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 《经济研究》第 6 期 50—58 页。
- 陆益龙, 2008, 《户口还起作用吗——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和流动》, 《中国社会科学》第 1 期 29 卷 149—162 页。
- 罗俊、汪丁丁、叶航和陈叶烽, 2015, 《走向真实世界的实验经济学——田野实验研究综述》, 《经济学(季刊)》第 3 期 14 卷 853—884 页。
- 孟凡强和吴江, 2014, 《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歧视与劳资关系城乡差异》, 《世界经济文汇》第 4 期 62—71 页。
- 万海远和李实, 2013, 《户籍歧视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经济研究》第 9 期 48 卷 43—55 页。
- 汪汇、陈钊和陆铭, 2009, 《户籍、社会分割与信任: 来自上海的经验研究》, 《世界经济》第 10 期 32 卷 81—96 页。
- 杨菊华, 2015, 《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第 2 期 61—79 页。
- 张文武和张为付, 2016, 《城市规模影响个人发展吗——基于能力差异和户籍分割视角的研究》, 《世界经济文汇》第 10 期 41—59 页。